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

齐裕焜 欧阳健 主编

中国历史小说通史

齐裕焜 著

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齐裕焜 欧阳健 主编



中国历史小说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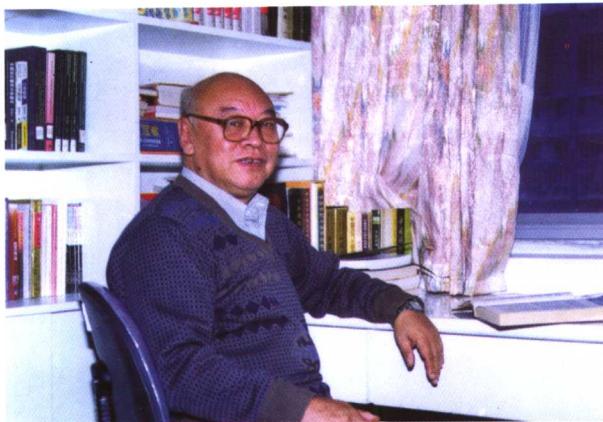
藏书

齐裕焜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齐裕焜，1938年生，福建福州市人。1965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福建省文学学会会长。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还著有《中国讽刺小说史》（合作），《明代小说史》，《隋唐演义系列小说》等。

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

凡例

△《中国小说通史》是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所规划的一套贯通古今的分题材小说史系列丛书，将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全部小说创作，均纳入研究视野之中，分《中国神怪小说通史》、《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中国社会小说通史》、《中国人情小说通史》、《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五卷。

△本丛书要求准确、明晰地勾勒中国小说演进的历史，在阐述小说发展的概况和延续轨迹的同时，较为准确、合理地划分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注重打通古今的界限，探索贯穿中国小说史的某种带规律性的东西。

△突出本丛书既是通史、又是题材演变史的特点，既要有囊括几千年小说发展史的总体的宏观的眼光，又要侧重于突出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某一题材的兴盛和衰变的脉络，溯源寻流，正确评价其在整个小说史中的比重和地位，从各自的视角出发，达到探寻小说发展规律的共同目标。

△在处理小说混类问题时，各部通史所关注的作品既允许有适当的相互渗透，更要注意有所分工、各有侧重，从不同的切入点去观照同一部作品，从而显示中国小说通史的总体风貌。

△在处理重要作家作品和一般作家作品的关系上，注意突出重点，以较多的篇幅集中剖析在小说史上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并以此为中心论及其他一般的作家作品，避免平均使用力量。

△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评价所涉及的小说作家作品，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尤其注意从每位作家、每

部作品所提供的前人所没有的新的东西，及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比较、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诸方面揭示其在小说史上应有的地位。

△详细占有原始资料，从资料本身中引出固有的结论，提倡经过认真思考的有创见的新论。

△体现小说史著作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重视在作家考证、版本考证、背景考证等方面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也注意突出情节结构、人物形象、艺术风格、思想倾向、审美情趣等方面的论析，做到传统研究方法与新型文学理论的有机结合。既要克服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也不追求时髦、采用未被真正弄懂的“新方法”，力求做到形式新颖、结构紧凑、语言流畅，可读性较强。

引　　言

我国是历史悠久，历史典籍极为丰富的国家，不但每个朝代都有官修的“正史”，而且还有大量的野史、笔记。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作为历史小说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优秀的历史著作，擅长战争描写；善于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处理得井井有条，结构绵密；善于通过行动和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等等，为历史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宋元时代，“说话”艺术勃兴。在“说话”四家中，最发达的是“小说”和“讲史”两家。民间艺人的“讲史”为古代历史演义小说注入了民间文学的新鲜血液，带来了勃勃生机，奠定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基础。戏曲、民间说唱等艺术门类中敷衍历史题材的作品很多，也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老百姓对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充满景仰之情；对历史上的邪正善恶有着鲜明的爱憎情感；对历史上生动感人的故事津津乐道，这为历史小说的兴盛奠定了群众基础，造成了一个广大的读者群。

历史演义小说在古代小说中蔚为大观，是最有影响的一种小说类型。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难，要求作家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直接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梁启超等人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强调小说的政治教育功能，要求小说为革新政治服务。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五四运动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左翼文艺理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唯物反映论为哲学基础，要求作

家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服务。现实生活吸引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倡导,因此,在近现代小说中,现实题材占据了中心地位,历史小说被挤到创作的边缘,特别是写帝王将相的题材遭到冷落。在“文革”前后,历史题材几乎成为创作的禁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历史题材的小说冲破禁区,蓬勃发展起来。80年代初期仍以农民革命、民族战争为主,不敢涉及帝王将相。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各种历史题材纷纷出现,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影视屏幕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在群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李自成》、《少年天子》、《白门柳》等先后获茅盾文学奖;《雍正皇帝》、《曾国藩》、《戊戌喋血记》等也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好评。但是,毋庸讳言,历史小说创作出现了鱼龙混杂,数量多而精品少的状况,而且篇幅越来越长,动辄数百万言,令读者和研究者望而生畏。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历史题材的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占据了文艺创作和演出的舞台,是一种不健康的文艺现象;有的则认为历史小说是通俗读物,不能登大雅之堂。当代的文学史家们更对它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由建国初期写起,“下限延续至90年代末”^①,只提到姚雪垠和凌力的历史小说,其它历史小说则未提及;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只用几十个字顺便提及《李自成》^②,其它历史小说,包括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没有提及。新时期历史小说的繁荣是一个客观现象,文学史家应该选择介绍其中优秀作品,批评其不健康的创作倾向,为历史小说的创作作出理论的总结。退一步说,即使这

^①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后记》,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9月版。

^② 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几百部小说均不足观，毫无可取之处，也应该对这种文学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潮作出评价和阐释，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总是不对的。

面对众多的当代历史小说，我们虽不可能一一去研究，但我们还是花费了较多的精力阅读了不少作品，从中选择了 12 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向读者作介绍，虽然不太全面，但希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为读者和专家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因此，在我们这本书中，古代小说和当代小说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历史小说的界定也是一个难题。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中说：“通俗小说中讲史一派，流品至杂，自宋元以至明清，作者如林。以体例言之，有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断代史者；有以一人一家事为主而近于外传、别传及家人传者；有以一事为主而近于纪事本末者，亦有通演古今事与通史同者。其作者有文人、有闾里塾师，瓦舍伎艺，大抵虚实各半，不以记诵见长。亦有过实而直同史抄，凭虚全无根据者，而亦自托于讲史。如斯纷纷，欲以一定标准挈其短长，殆非易事。”由于历史小说的界定，“殆非易事”，因此，我们在本书中用较多篇幅回顾了历代有关历史小说的论争，阐述了我们对历史小说的看法。

在古代部分，过去习惯将英雄传奇小说归为“讲史”，我们将它分离出去，归入本套丛书的《英雄侠义小说通史》。文言小说中大体属于历史题材的，在历史演义小说之前的作品，从对历史演义小说影响的角度予以论述；在历史演义小说产生之后的这类文言小说，我们就不再介绍。在现当代部分，把那些虽然历史大背景是真实的，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新历史小说”也剔除了。因为我们认为历史小说应该在大体上于史有据，即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应该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历史事实，否则就不属于历史小说的范围。如果只要有一点历史影子的小说都算作历史小说，那么历史小说的范围就无限扩大了。总之，我们是持比较

狭义的历史小说观。

在我们简要地将本书论述的范围作了说明之后，还是让我们进入正题，和读者一起走进历史小说的百花园中，去领略我国从古代到当代繁花似锦的历史小说；一起走进历史的画廊，欣赏我国深广的人文地理和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历史人物一起去经历时代的沧桑，去感受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和那真、善、美的理想和追求。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众说纷纭的历史小说.....	1
第一节 古代对历史小说的歧见.....	1
第二节 现当代关于历史小说的论争.....	8
第三节 历史小说的界定	18
第四节 历史小说发展的轨迹	23
第二章 在丰厚的历史土壤上成长	30
第一节 史学著作对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30
第二节 两汉至宋元的文言历史小说	44
第三节 历史演义小说的雏形——“讲史”	66
第三章 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三国演义》	77
第一节 史书与“讲史”的结合	77
第二节 “有志图王者”的启示录	82
第三节 “拥刘反曹”与道德悲剧	92
第四节 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	104
第四章 丰富多彩的历史演义小说(上).....	118
第一节 上古史和列国志系列小说.....	118
第二节 两汉系列小说.....	135
第三节 《东西晋演义》和《南北史演义》.....	149
第五章 丰富多彩的历史演义小说(下).....	165
第一节 反映隋唐五代历史的演义小说.....	165
第二节 《南北两宋志传》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185
第三节 《英烈传》等反映明代历史的传记体小说.....	193

第四节	反映明末清初历史的时事小说	201
第六章	转型期的近现代历史小说	219
第一节	历史小说观念的演变	219
第二节	蒙古民族史诗《青史演义》	225
第三节	《痛史》和《吴三桂演义》	238
第四节	《洪秀全演义》	248
第五节	《孽海花》	257
第六节	现代短篇历史小说	268
第七节	李劫人和他的“大河小说”三部曲	281
第七章	百花争妍的新时期历史小说(上)	299
第一节	姚雪垠的《李自成》	299
第二节	徐兴业的《金瓯缺》和凌力的《百年辉煌》	318
第三节	杨书案、刘斯奋的历史文化小说	356
第八章	百花争妍的新时期历史小说(下)	397
第一节	二月河、颜廷瑞、吴因易的帝后系列小说	397
第二节	任光椿、唐浩明的近历史小说	434
第三节	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和黎汝清的《皖南事变》	
		465
第九章	台湾、香港的历史小说	481
第一节	高阳等台湾历史小说	481
第二节	高旅等香港历史小说	493
后记		507
主要参考书目		509

第一章 众说纷纭的历史小说

第一节 古代对历史小说的歧见

我国是史学传统渊源极为深远的国度，至少从西周起，整个文化便是一种史官文化。史学处在学术殿堂的高层次，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化，史学著作几乎成了先秦时期唯一的著作。因此，及至汉代，才出现比较接近“小说”概念的论说。西汉之际的思想家桓谭（约公元前 23—公元 50）在《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比较切合古代小说萌芽时期的特点，但概念还是含糊不清。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小说家”，记载了“小说”篇目，并写下按语：

右小说十五家，计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缓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莞狂夫之议也。

班固作为史家，记录了 15 家小说书目，承认了“小说”的独立存在，但所列的小说 15 家，内容芜杂不一，有的介于子史之间。总之，在魏晋之前，“小说”概念朦胧，当然更谈不上小说的分类了。到了魏

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大量涌现，小说逐渐走向成熟，可是，魏晋南北朝人不象汉代人那样重视小说理论的研讨，而更注重创作实践。所以，小说理论观念并没有进展，仍然把小说与历史混同，就象干宝在《搜神记》序中那样，声明自己那些神怪故事不是出于想象与虚构，而是忠实地记录史实。正如鲁迅所说：“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①。“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②。

只有到了唐代，特别是宋元之后，小说的概念才逐渐清晰起来，而且对小说进行了分类。因为宋元之前只有文言小说，因此，首先对文言小说进行分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论著。他在《史通·杂述》篇中，第一次将文言小说进行分类：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鹜，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

刘知几从史学角度，认识到小说与史书同属记事体。史书记载国家大事，必有所阙，故有“偏记”小说的崛起，因而其分类的特点，在于抓住记事这一特征，把除正史之外的“记事”作品都归入小说。但他并不懂得记事体有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把郡史、家史、都邑簿、地理书都划入小说，使小说的概念非常芜杂。不过，他提出的“琐言”、“杂记”、“逸事”大多可属小说范围，而其中“逸事”类的一部分作品

^①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鲁迅全集》第8卷 3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12月版。

^② 同上书，323页。

可视为文言小说中的历史小说。他还指出，“逸事”类小说的产生，是因为“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他认为小说起源于史传，而“补史之遗”是其主要特征，刘知几的观点对后代影响极大。

白话小说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唐代“变文”，然而勃兴当在两宋。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繁荣发展，市民娱乐的伎艺亦很丰富，“说话”行业随之兴起。宋元话本的出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白话小说蓬勃发展，汇成洪流。宋代“说话”由于说话人是根据各自所说的内容题材的主要特点分家的，于是以历史为题材的“讲史”成为一种最主要的“说话”类别，为中国历史演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完成于南渡之后。卷五《京瓦伎艺》云：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王颐喜、盖中宝、刘名广……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

从这段话可知当时不但有“讲史”艺人，而且有说三分，说五代史的具体分工。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首次提到说话人分四家的情况：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朴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庚谜，本是隐语。

耐得翁所云“四家”，由于表述不够严密，因而后来论者归纳四家时，多有出入。但“讲史”是独立的一家则无疑义，而且明确指出“讲史”是“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也就是说根据“前代书史文传”，主要讲“兴废争战之事”。宋末元初罗烨的《醉翁谈录》在《小说开辟》一节中进一步举出话本名目来叙述当时“说话”的题材和情景：

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杆棒、妖术、神仙。
自然使席上风生，不枉教座间星拱。说《杨元子》、《汀州记》……此乃是灵怪之门庭。言《推车鬼》……，此乃烟粉之总龟。论《莺莺传》、《爱爱词》……，此乃谓之传奇。言《石头孙立》……《戴嗣宗》、《大相国寺》、《圣手二郎》，此乃谓之公案。论这《大虎头》、《李从吉》、《杨令公》、《十条龙》、《青面兽》……此乃朴刀局段。言这《花和尚》、《武行者》……此为杆棒之序头。论《种叟神记》、《月井文》……此乃神仙之套数。言《西山聂隐娘》、《村邻亲》……此为妖术之事端。也说黄巢拔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才；收西夏说狄青大略。

罗烨在前面列举了“灵怪”等八门，后面则分述“讲史”的内容，有黄巢、赵正、刘项、孙庞等故事。

罗烨等人对“讲史”的记载，可以说是第一次把“讲史”归入小说的范畴，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而不是作为历史的附庸来论述。

在史传和讲史的基础上产生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它“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既不像历史著作那样深奥难懂，

又不像“讲史”平话那样“言辞鄙谬”，既能使读者了解历史，满足人们对历史的兴趣，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得到艺术享受。“雅俗共赏”，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普遍欢迎，因而从明代中叶起，形成了历史演义创作出版的热潮。以汉末三国的历史为中心向两头扩展，上自盘古开天地，下迄清宫演义，每个朝代都有演义，有的朝代有好几部演义，到了清末共产生了约 80 部左右。正如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叙》中所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

随着创作热潮的出现，对历史小说的理论探讨也发展起来。小说理论家通过序跋、评点，对历史小说创作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家对历史演义小说的性质、它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大致有两种不尽相同的见解。

一种强调历史演义小说应忠实于历史，只是把历史通俗化。庸愚子即明弘治间人蒋大器，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分析了历史著作和野史评话的弊病。历史著作“理微义奥”，难以普及，“故往往舍而不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因此，要创作历史演义小说，“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记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他们对历史演义创作提出了以下几条原则：(1)要忠实史实，做到“羽翼信史而不违”(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清代蔡元放谈到《新列国志》改编时说：“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事实都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2)历史演义小说的作用是把历史通俗化，条理化。“演义者，以通俗为义也”(陈继儒《唐书演义序》)。甄伟说：“两汉有马迁史，辞简义古，为千载良史，天下古今诵之，予又何以通俗为耶？

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西汉通俗演义序》）。史书记载的史实比较分散、杂乱，历史演义则“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余象斗《题列国序》）。（3）对正史起演绎补充的作用。正史叙述比较概括简要，通俗演义使之更详细、更丰富。如陈继儒在《叙列国传》中说：“补足经史之所未赅。”史书“一言而包尽良相之大功，一笔而挥全英雄之伟绩”，所以需要历史小说“揭一朝一段之事，详一将一相之功”（李雨堂《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叙》）。（4）在忠实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在文字上增添润色，增加它的生动性，可读性。甄伟谈到他创作的《西汉演义》时说：“若谓字字句句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所以可观道人说：“虽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只要“大要”不违“其实”，可以加以增添、润色。

另一种意见比较强调历史演义小说的文学性。他们重视历史演义小说传播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进行道德教育的功能，但认为应当允许艺术虚构，强调历史演义小说的审美特性。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家熊大木指出：“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异同者，两存以备参考。”“质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无足怪矣”^①。明酉阳野史也认为“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②，肯定了历史书与历史演义小说性质不同的特点，不能等同，不能互相替代。

明万历间著名文学家谢肇淛肯定小说的艺术虚构，提出“虚实相半”的重要论点。“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向其有无也”。谢肇淛肯定了艺术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且着眼艺术的审美意象，只要“情景造极”，达到审美要求就可以了，“不必问其有无”。但是，

^① 《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

^② 《新刻续编三国志引》。